



2 021 5919 0

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鏊

集

汪向荣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赵朴初

装帧设计 周 雷 章桂征

G.A.S. 104

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鉴 真

汪向荣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印张 4 $\frac{1}{2}$ 插页：4 字数：91,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11091·39 定价：0.56元



鑑真和尚遺像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 供稿



鼓揚鑑真精神
 神為中日文
 化交流事業
 而辛勤努力
 祝賀
 鑑真東渡刻本
 的寫成預祝
 鑑真東渡演出
 的成功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
 趙朴初

上 一九六三年日本文化代表团团长安藤更生博士把本乡新仿制的鉴真和尚坐像赠送给我国，由郭沫若院长接受。

安藤夫人 供稿

下 为迎接鉴真和尚遗像回国探亲，中国实验话剧院正在排演《鉴真东渡》话剧。这是赵朴初同志为此写的祝词。



◇ 鉴真法师历尽劫波，东渡日本的
登陆地——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
(今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秋目)

◇ 鉴真大和尚上陆地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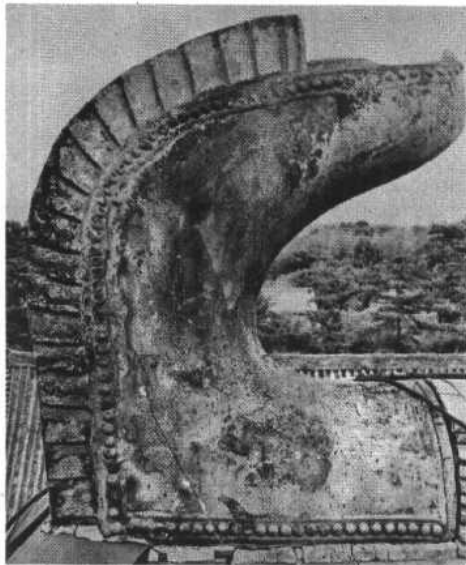




◇ 金堂外貌

金堂内部佛像 ◇





上图 金堂西鸱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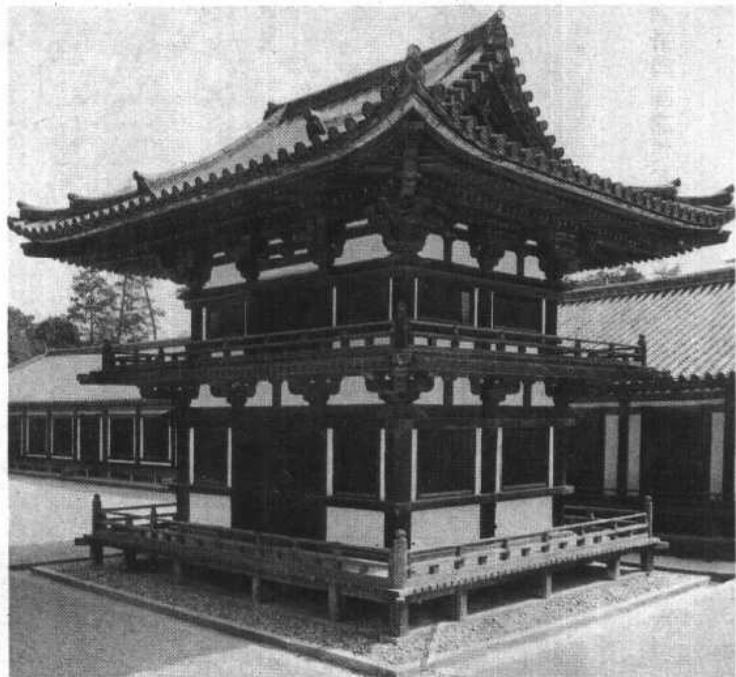
下左 众宝王菩萨像



下右 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鼓楼（西南面）
仁诏元年(1240)造



礼堂（南面）
弘安7年(1284)造





《东征画传》（局部）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 供稿

序

中日两国，地理上一衣带水，文化上脉络相通，两千年来，我们祖先中有多少杰出人物，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曾作出巨大贡献。唐代鉴真和上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以深远的识见，忘我的精神，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能，战胜重重困难，历十二年之久才完成夙愿，不仅把佛教戒律，而且也把唐代文化精华带到了日本，广泛传播了中日人民间的友谊种子。因此一直到现在，始终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怀念和尊崇。

建国以来，两国有识人士曾为中日人民的世代友好，作出了不少努力；现在随着和平友好条约的成立，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又得到新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鉴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今天来纪念鉴真和上，更具有重要意义。去年邓副总理访日时，曾同意唐招提寺森本长老所提鉴真和上回国探亲；今年邓副委员长到日本，又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我能亲预其

事，感到十分欢喜庆幸。

日本方面对鉴真和上的研究，不但多而且精；像安藤博士的《鉴真和上传的研究》更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我国在这方面是瞠乎其后的，现在向荣同志著校的《鉴真》、《唐大和上东征传》出版，稍弥此憾。向荣同志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用力甚深，上述校著，特其绪余而已。《鉴真》一书并将发行日文版。值此鉴真像回国巡行之际，亦以此表达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心情。缅怀往昔，策励来兹，愿与日本各界朋友，在鉴真精神的光辉照耀下，互为砥砺。

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从这立场出发，我愿介绍这本书。此序。

赵朴初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

前 言

中国和日本，在最近一百年来，国家之间虽然有过两次战争；可是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却始终没有中断。这原因，地理上的相邻是一个，但决不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长时间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两千年，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因为有这样悠久深厚的基础，所以近百年来，的不愉快、非友好也不能破坏这种血肉相连的友谊。一百年，虽然不是一个短时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毕竟祇是短暂的瞬间。过去两千年间，中日之间也有过几次战争，但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过去两国人民在文化上互相交流、互补短长，从而促进在生产上、技术上的共同进步，形成了决不是任何力量所能破坏的友好纽带。

在回顾到两千年来中日两国间友好和不友好历史时，不能不使人们怀念那些在过去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出过力，甚而付出过生命代价的先辈。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他们所缔造和维系的传统友谊，我们在今天，决不可能享受这些友好合作成果的。饮水思源，在为世代友好事业而作出努力的时候，对过去曾为两国友谊出过力的先辈，当然会怀念和崇敬的，也必然会以他们为法的。

在这无数先辈之中，鉴真是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一位。当时，一千二百多年之前生产技术还不十分发达，从中国到日本要冒风波之险。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他为了弘法——实际上是传播唐朝的文化和技术，用坚韧不拔的决心，不顾自然和人

为的阻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一次又一次的东渡。先后十二年，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呀！不但他的爱弟祥彦、日本学问僧荣睿寂化，连他自己也双目失明了。就在这样横逆频加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初衷，夙志不变。多么伟大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呀！因为有这样不屈不挠的奋斗，所以一直到今天还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尊崇和怀念。

当然，鉴真从接受日本学问僧的恳请以后，一直到在日本寂化为止二十二年中的经历是不平凡的。不但在六次东渡中受到中国保守落后势力的破坏、阻挠，就是到日本以后，在得到以天皇朝廷为中心的统治势力支持、优遇的同时，也遭到反动保守一派的诽谤和仇视。就在这种环境中，他用艰苦卓绝的毅力，克服一切困难，在佛学、美术、医药、建筑和雕塑等各方面，把唐代的灿烂文化带到了日本，替天平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因此在今天，谈论和纪念这位在两国通交关系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鉴真，是两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为了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回忆一下先辈走过的足迹，不但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

但是，过去对鉴真事迹的介绍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祇介绍他东渡时的艰难困苦和到日本后的受尊崇，以及对日本文化所起的作用。这些当然都是事实，可是历史往往并不祇是一面，不是祇有光明也有其阴暗一面的。有人认为把鉴真一行到日本以后受排挤、打击的史实写出，会影响中日友好，损害鉴真伟大的形象。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我以为祇有如实地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才是真正的历史工作者所应干的，不但不会影响两国关系和损及鉴真的形象；正相反，从鉴真和南都旧教团势力的斗争中，更能看到鉴真和他周围一些人的高大形象，和日本人民对他们的支持，从而格外加深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我这样做了，也希望我的友人这样做。但我也了解，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困难的。果然，有人劝我改写，有人希望我不要离开已有的说法。本着对学术的责任感，我无法从命，这样我的研究就祇能留着自己欣赏，而没有机会向大家请教。但是我相信总会有一天，这种观点能得到公诸学术界，抛砖引玉机会的。不出所料，经过十五年以后，“四人帮”倒台了，学术研究得到新生，我终于获得了公开这一论点的自由，这就是一九七八年《鉴真在日本》一文发表的由来。《鉴真在日本》是本书的一章，现在发表的，是其全部。因为是二十多年前的旧稿，虽然经过修改，但无论在观点上、逻辑上以及用语上，一定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我一定逐一研究考虑，以使这“奇谈怪论”更臻完善。

需要申明的，书中所引文献、资料，我尽可能一一注明出处，以备查核。但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是我四十年来抄摘的。丙午浩劫，我手边资料图书散失殆尽，今天已无可能逐一加以核对，因此外误、错漏，恐所不免，请原谅。以后如有可能，还将一一查核的。

四十年来，我从事中日通交关系史的研究，除了丙午以后二三年环境实在不许可之外，没有中断过。虽然近三十年来我没有可能把我的成果就教于国内外学术界；但在鉴真精神的感召下，我从没有灰心；尽管我不能与之相比，但四十年前的初衷，到今天是更坚决了。这书的出版，算是我心愿的一角吧！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得到师友们的帮助不少，特别是四十年来始终一贯对我加以协助和指导的实藤惠秀博士。在研究鉴真过程中，安藤更生博士的力量更大，他以近百年来日本方面鉴真研究最高权威的身份，无微不至的加以协助。可惜这本小书和《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本出版的时候，他已看不到了。在

这里仅向他们两位致谢，并愿安藤博士安息。最近几年的研究过程中，胡锡年同志、望月八十吉教授、森本孝顺长老、岛田政雄先生、藏中进教授和今枝二郎教授给我的帮助也极大，在此顺表谢忱。今枝二郎氏更将本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同时出版，对我本人来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同时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一佳话。

赵朴初同志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签，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和安藤更生博士夫人为本书提供图片，都使本书生色不少，谨在此致谢。

在出版过程中，曾得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佟冬院长，《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王慎荣同志、周雷同志，尤其是周雷同志的鼓励。叶幼泉、王庆祥两同志为整理本书，也出了力。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书是不可能这样快和读者见面的。在这里也表示谢意。

总之，这本书的出版，体现了党的双百方针，也同上述各位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分不开的，而我，只是一个执笔者而已。

最后，我想重复一句我在发表《鉴真在日本》一文时说过的话：“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为了中日文化交流，我还坚定不移地战斗着。”

汪向荣 七九年八月

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上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交通频繁，关系密切。即使在两国政府之间发生冲突，或中断外交的时候，人民间的通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从未间断。在世代悠久源远流长的中、日两大民族的友好交往史上，为交流文化，沟通思想学术，相互了解和增进友好关系，出现了许多著绩当时、扬声后世的人物。中国的鉴真和尚，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就是在八世纪中一东渡一西来，都没返回各自的祖国，瘞身客邦，交相辉映的“双璧”。阿倍仲麻吕的行事已载入我国史籍，鉴真和尚的业绩，一般似还不够熟悉。现综合中日两方有关载记，为鉴真作行传。

唐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让步政策，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社会生产力不断上升，人民生活安定，形成了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充沛的局面。随之，在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获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直到今天还是令人惊叹的。强大的唐帝国和周围国家间的贸易、交通也比过去频繁紧密。就在这种交往中，唐朝不但吸取外来的文化，加以溶化而成为中国文化；并且也不断输出中国固有的、和经中国吸收消化了的外国文化。当时在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由于比中国落后，所以也都把唐帝国当作吸取、效法和学习的中心，形成了以唐帝国为核心的文化圈。在这些国家中，有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有南方的林邑、真腊等国家，其中也有日本。

日本和中国的往来，早在公元以前所谓日本的阙史时代就已开始。正式见之于中国史册的，则在一世纪中叶，当时日本九州的奴隶主们已正式向中国王朝派遣使者，接受中国的封赠。唐代，在日本是作为古代奴隶制统治制度的氏族制度已趋解体，逐渐从地域分封而走上统一的律令制国家的白凤、奈良到平安时代。在新旧交替过程中，不但表现为奴隶和被统治的人民反抗起义层出不穷，而且也表现为奴隶逃亡的人数不断增加的消极抵制。面对这种局势，当时日本的统治阶级——奴隶主豪族们不能不多少作些“让步”，例如停止把人民当作奴隶而任意买卖，不再剥夺他们结婚、和家族同居等自由。同时，又采取了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的手段，大量地榨取他们的劳动所得，只留下极小的一部分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使之处于农奴的地位，律令制就是保证这些奴隶主们统治地位的。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对这种新的剥削手段和统治方法缺乏经验，因而，以皇室为中心的奴隶主豪族势力，极力吸取中国和朝鲜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方法，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势力，战胜了其它比较落后的氏族，在大和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用施行律令制等方法来加强他们的统治。

从他们和朝鲜、中国交往中，使他们认识到要吸取和学习新的统治和剥削人民的经验，把原来落后的生产力提高，以适应新的形势，就必须以当时文化水平远比他们要高的唐帝国为师。因此，从七世纪到九世纪，即中国的隋、唐两代的整整三百年中间，以皇室为中心的日本统治阶级，冒风犯浪，横渡东海向中国派遣使节——遣隋使、遣唐使，偕同留学生、学问僧和其他技术人员到中国学习，吸收和输入中国的文物制度、学术思想、技艺制作和生产方法等各方面认为有用的东西。“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①这是派遣使节到中国的